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潮动中原”系列报道之二十九

河南价格和中原产业的市场话语权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核心提示

在国际市场空前一体化的今天,市场价格话语权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在某个行业或领域是否有价格决定权,已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掌握了市场定价的主动权,就等于在产业链的终端“大权在握”,对于一方经济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促进作用。如今,大豆、铜等许多产业的定价权,都已经或正在向我国倾斜靠拢。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河南价格”、“郑州价格”也具有参与部分产业定价权的能力。

河南掌握食品终端产业话语权

2008年,粮食问题骤然变得敏感,国际市场稻米价格在一个月上涨超过50%,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价格涨幅竟然超过140%,飙升的粮价在海地、菲律宾等37个国家引发抗议和骚乱。

然而,中国百姓感受到的,却是粮价的波澜不惊。95%的粮食自给率让中国人感到心安,河南作为中国的“粮仓”,在这场被联合国称为“一场飓风”的危机中,成为祖国粮食安全



“郑州服装价格”影响全国

的坚强后盾。

到2007年,河南粮食产量连续4年创历史新高,是中国粮食发展史上第一个实现千亿斤的省,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同时,河南还有着全国第一的饲料产量、全国第一的牛饲养量、全国第二的羊饲养量、全国第三的生猪饲养量和棉花产量……

在“粮仓”到“厨房”的转型中,雄厚的农业基础成为河南食品加工产业的强大后盾;河南省粮食加工规模和畜禽加工规模,全国第一;河南省方便面、饼干、速冻食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今天,河南粮食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郑州价格”已成为国际粮食市场的主要参考价格,河南的粮食产业和食品加工产业对于全国同类产品,有着不容忽视的价格指导作用。

在专家看来,食品加工是中原产业集群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具有相当的规模优势,始终牢固占据着高端产业链。如今,思念、三全、双汇、众品等河南食品加工业的“巨头”,不仅称雄全国,而且在世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在产业链条的终端,河南的食品企业有着毋庸置疑的定价权。

谈起“河南价格”领跑粮食和食品加工领域的深层原因,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王文广说:“河南的食品加工业首先有着农业大省的雄厚资源做后盾;其次其产业又形成了升级和集群,这些企业还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品牌、人才、资本等高端核心资源的建立,双汇、三全、思念等企业已经建立起了国家级的实验室甚至博士后工作站。这些原因使得河南成功实现了从‘中国粮仓’到‘中国厨房’的角色转变,‘河南价格’和‘郑州价格’不仅在国际粮食市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在与之相关的加工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拥有了与粮食价格一样牢固的市场价格话语权。”

郑州服装价格影响全国

“去银基淘衣服”,如今是大多数郑州女性逛街购物时不可缺少的环节。银基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直接催生了郑州服装批发市场群体的诞生。如今,银基已成为在中部极具影响力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并以其为基准,形成了在华中一代极具影响力的郑州火车站大型商圈。

火车站周围大小有11家服装批发市场,商户1万多户,服装从业人员30万人。这里每年销往全国各地的服装达5亿件,年成交额超过100亿。

“郑州服装价格”已成为全国服装

价格的“风向标”,这里的价格浮动,直接影响到全国服装市场的价格走向。

郑州服装价格在全国占据如此重要地位,并非出于偶然。郑州是全国著名的老纺织工业基地,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人们穿衣、就业,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传统优势的纺织工业作为依托,郑州的服装产业在新时期起步之初,就非常抢眼。早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人的审美还停留在“蓝大褂”时,郑州的一家服装厂就生产出了令首都人眼前一亮的“蝙蝠衫”、“公主装”等新潮款式。

如今,郑州已成为中部服装输出的重要平台,每个清晨,当大半个城市还在睡梦中时,周边省市的零售商就已在火车站商圈川流不息、忙碌不已。他们打包的衣物将“郑州价格”带回各地,从而波及整个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服装市场。

“郑州火车站商圈的服装价格,基本上就是全国服装价格的‘晴雨表’。”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当前,一个以郑州为中心,中心城市和农区协调发展的纺织业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郑州成为设计研发和服装加工中心,洛阳、新乡、安阳、许昌等中心城市成为化纤和终端纺织品制造基地,周口、商丘、开封、南阳等农区成为棉纺生产基地。王文广教授分析道:“郑州服装价格的优势,其一来源于郑州火车站是亚洲最大枢纽站这一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其二是因为有着纺织工业基地的传统优势,有着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其三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群,有着极强的规模效应。”

在选择日益多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要保证客流不被周边省市所分流,继续以“郑州价格”影响全国,不仅仅依靠郑州现有的优势、满足于现状,而是应该继续升级市场,延长产业链条,继续细分市场,将蛋糕做大。

继世贸商城和银基商贸城之后,天隆服装城和锦荣商贸城也已经把商务化升级改造提上日程,不难看出,郑州服装批发市场已迈向向商务化迈进的步伐。郑州服装批发业的同行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着共赢,即保持区位优势,延长产业链条,掌握高端市场资源,继续以“郑州服装价格”影响全国。

豫企重组:谋求价格话语权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2007年以来河南企业界的主旋律,那就是“重组”。国企重组的初步布局已悄然完成,其目标是省管企业从34户减少到20户左右。有媒体称:豫企重组,

采用的是减法的手段,其实直指的是加法的目的,虽然数量上减少了,但是规模、实力、销售人都将大幅提高,从而改变豫企布局分散,产业集中度低的现状,最终为河南企业群体谋求市场价格话语权。

河南省国资委监事会主席李海坦称,尽管河南省GDP连续几年位居全国第五,但企业“个头”普遍偏小,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未能打造完成,缺乏一批竞争力强、具备国内国际定价权的大企业集团。

前几年曾辉煌一时的河南大周镇的“金属报价”,如今在新一轮经济危机中遭受了原材料成本和市场的双重挤压,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废旧金属收购和初步加工,作为原材料工业只是产业链条上的一个终端,对于市场信息的反馈比较滞后,下游销售市场出现波动很久后,才会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这时已经很难再及时做出相关调整,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漩涡中随波逐流,毫无还手之力。

在有色金属领域,大周镇是整个河南的一个缩影。河南虽然也是有色金属工业的大省,却没有一家企业能在行业中具有绝对强大的话语权。这是因为,河南有色金属工业虽然分布众多,产量高,但是总体上仍仍然处于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有业内人士总结说,从事有色金属行业的豫企虽然数量不少,但是“生产布局分散,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对于价格标准没有决定权”。所以当前此行业的“河南价格”、“大周行情”也只是行业基本走向的总体反映,只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参考性,而不具备决定整个行业价格水平的权力。

河南省国资委监事会主席李海坦是成立河南有色金属控股公司的积极推动者,注册于郑东新区的河南有色金属控股公司,由神火集团、豫联集团和伊川电力共同出资5亿元组建,目的就是强化巩固河南在资源性行业中的话语权地位。

“河南价格”:任重道远

“河南价格”、“郑州价格”在近年来经常



郑州科技市场已成为中西部IT商品的价格风向标

被媒体提及,并且在一些行业网站上频频出现,这说明在很多产业中,我省已经具备规模优势,尤其是一些细分型的市场亮点上。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粮食、食品加工、服装批发等领域,在其余一些产业的局部领域,“河南价格”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郑州陈砦蔬菜批发市场,郑州果品物流批发市场等大型蔬菜配送批发中心,有着完善的市场管理、良好的服务、快捷的信息,巨大的客流量和交易额,辐射全国30多个省市,已成为南方、北国、沿海、西部的蔬菜水果集散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蔬果商农。以其为中心形成的蔬菜、水果价格行情,被国家商务主管部门当作重要的参考依据。

位于文化路和东风路交叉口的河南科技市场,是河南省最大的IT产品集散地,是全国七大常设技术交易场所之一及中西部地区技术交易中心。有着我国中西部“科技第一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中原腹地的“硅谷”等别称,其各类IT产品辐射周边省区和地市,远销美国、加拿大及东南亚诸国,成为中西部地区IT商品的价格风向标。

这些亮点产业所造就的“河南价格”,虽然有着郑州作为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但更重要的是,是其形成了规模效应,注重技术研发,并打造了完善的产业链条。这是那些由于种种历史或当下原因,而尚未取得价格话语权的豫企所应制定的发展轨迹。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ynews.com

对4万亿要体内监督 更要体外制约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近10年来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方案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其总额高达4万亿元。为确保投资到位和避免腐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等部门将组成一个跨部级督察小组,对投资项目和资金进行监督和管理。(11月14日《每日经济新闻》)

作为权力制约制度化的体制内表达,跨部级督察小组无疑迅速回应了坊间的某种担忧。4万亿元的投资,又被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花出去,能不引发地方争相“跑部钱进”的歪风,助长不理性的拍脑门决策吗?君不见,这边的投资计划话音刚落,那边发改委已经门庭若市,俨然“发钱委”。我不是要预断掌握投资发放之权的官员一定会腐败,但谁也无法否认这项庞大投资计划中所蕴含的种种腐败机会。拨给这家是拨,拨给那家也是拨,最终拨给哪家里面就大有“操作空间”了。

基于对中国现阶段官场腐败生态的认知,民众对腐败的担忧几乎与这4万亿元投资计划同步出炉。各类媒体也借助各种形式的评论向官方递送了民间的这些声音。官方从善如流,通过“跨部级督察小组”等形式加强对投资的监察,这是一个“责任政府”和一个“服务型政府”必须去做的。然而在反腐败上,先有体制内的监督,先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还远远不够。如果权利不能监督权力,如果这4万亿元投资计划公众没有知情权,没有监督权,没有救济权,腐败的阴影仍将笼罩着这项“民生工程”。

从中国的反腐败实践来看,“以权力制约权力”并不缺乏,举凡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察以及党的组织监督、纪委监督等等,已然蔚为壮观。近年来,在“预防胜于惩治”的指导思想之下,反腐败阵地前移,“国家预防腐败局”也破土而出。但遗憾的是,这些监督制度虽然林林总总,但有效的却不多。君不见此番4万亿元投资计划,居然由政府自行发布,这其中,看不到人大、政协或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身影——至少在公共媒体上我们是没有看到!国家依宪法和法律设立这些机构,不能仅仅是个摆设。

对于体制内监督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推陈出新,而是使现有的制度“有效”起来。比如说这4万亿元投资,首先就应纳入人大的预算审查。涉及国计民生的庞大投资,应由人大或其常委会来审议批准,审议过程中,代表或委员们的赞成票多少、反对票多少、各执何理由,都应公之于众,让民意来检验代表或委员的“民意代言纯度”。

除却改革与完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使其“有效”,更重要的是,还是要放开管制,让社会力量和个人介入反腐败,让权利来制约权力。与跨部级督察相比,作为纳税人的民众与这4万亿更是休戚与共。要相信民众的理性才是“有效监督”最大动力。较之与部门利益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体制内监督,公民基于自身利益而加入监督行列中来有着更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如有相关部门所解释的,这4万亿本身就是“民生工程”。如此,有什么理由不让民众参与监督,并自己作自己的主? 王琳

爱心群体印证文明本质

城市文明建设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于这些表象之上。

高新海是爱心群体的核心人物,他对生活、对生命的达观态度,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爱心群体的每个人,这是爱心群体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他是爱心的受助者,也是助人者。他的自尊、自强、自信、自立,他帮助别人的点点滴滴,使得爱心群体有了最温暖的集体记忆。爱心群体表现的可贵品质,也是高新海自身的映照。

文明,像我们这个社会生命共同体一样,存在的基础就是集体记忆。爱心是不能忘记的,好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忘记的,悲喜交加的岁月是不能忘记的,每一个关爱的细节是不能忘记的。我们的生命不是苟活,爱心群体显现的仁爱、博爱

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让我们对善与恶、美与丑有更准确的辨识。只要我们的社会尚有缺陷,只要我们还面临社会变化的压力,必然会寻求精神的慰藉,想方设法获取理想的补偿。因而,从这个积极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城市文明是运动着的,不可更改的绵延,仁爱、互助、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关乎世道人心,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陇海大院现象,是城市文明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体现。我们见证陇海大院现象,从情感上认知爱心群体时,它带给我们以向上的精神力量。我们在追求社会理想境界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弘扬陇海大院精神,创造社会和谐,使我们的城市形成浓厚的和谐、向善的人文氛围。 今语



重庆一岩石现人像,夜间发光。当地民众以为神灵,膜拜之。政府怒,欲炸石。 邝飏图



安徽砀山县成立“空纳办”以遏制吃空纳。 以升图

别忙着批评火海坠亡女生慌不择路

我注意到香港《文汇报》用的小标题——“迫于无奈,求生变寻死”,报道还强调了一个细节:“有目击者表示,其后两名女生明显是迫于无奈跳下,其中一个用手抓着露台铁栏,后来火烧过去了,她只好跳了下来。另一人被逼到露台角落,身上的衣服已被点燃,最终也被迫跳楼求生。”

相较而言,我更相信这样的表述与立场。一者,6楼阳台,不要说大学生,就是稍有常识的小学生,也断不至于贸然“跳楼求生”,与其活活烧死,不如跳楼求死,这是没有

悬念的选择;二者,所谓“慌不择路”的说法,太过寒冷,此情此景,换作其他人,恐怕都会惊慌,冷静下来会选择什么路,门是打不开的,灭火器是过期的,大火越烧越旺,一面是火海,一面是阳台下的天空,请问,该择哪条路?

一场大火检验了一些消防设备的保质期,只是这个成本太高。我想,须先有了一个可供安全救济的环境,再来检讨人的求生能力,这样是不是更好?如果有一条可见的安全通道,再惊慌,他们也应该能择到那条求生的路。 宋芳

王志丢手机何以触动公众神经

14日晚9时30分许,北京朝阳区北京嘉里中心饭店,央视知名主持人、丽江挂职并主抓招商的副市长王志出席某论坛期间,其两部手机被盗。因其中存有不少央视、新华社同行电话,及丽江官员电话号码,警方高度重视。当晚11时许,多辆警车停在饭店附近,数小时后迅速将失物找回。(11月16日《新京报》)

我浏览了一下新闻后的网友跟帖,多数网友对王志的手机失而复得并不抱欣慰态度。甚至尽展幽默才华,对警方涉嫌破案进行意味深长的“反弹琵琶”。

何以如此呢?我认为这是两部手机触动了公众脑中的两根脆弱神经。其一,王志手机里的电话号码真的重要到需要调动数量庞大的警力旋即侦破吗?网民是质疑的,我也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昆明不是搞了各级官员一把手公开办公与手机号码吗?王志丽江那部手机中里的官员手机号码,即便流落民间,也没啥大不了;而央视、新华社同行的电话也不该成为秘密。这些权威媒体人士的电话,或许能让有新闻爆料的“线人”更易及时地找到爆料的直接对象。

再者,事件再次证明,名人地位依然优越,普通公众的公共安全资源依然单薄。名人丢了手机,可以在几小时内便神奇地失而复得,还带走了嫌疑人;而普通公众呢?谁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周中华

公众期待个税起征点调高

扩大内需、减税让利政策目前尚未涉及个人所得税调整。14日,王军在发布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税起征点的问题正在研究,财政部将会根据消费支出和物价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11月15日《新京报》)

当前,坊间对个税起征点有两方面微词:一是两次起征点调整都显得太保守,与民众期望相差太远。二是起征点一刀切。这就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恰是以公平的名义违背公平。此外,当前的个税采取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度,并未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对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来说,显然不合理。

如何进行个税改革?笔者认为有三种方向值得考虑,一是个税起征点应与CPI挂钩。即建立个税调整与物价水平同步的联动机制,使个税调整机制化。二是改变单一的以个人征收的方式,推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综合扣除的方式。三是改变当前个税边际税率加速度过快的情况,使个税制度更公平合理,使中低收入者受益。此外,不能仅仅盯着个税改革,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税制的配套改革,最终使国人的税负更趋合理。 王川